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上海及其近郊农村公办教育的重建

大泽肇

摘要：建国初期，学生和教员层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新政权，中共政权对于他们所“持有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具有很强的戒备心，然而，学生和教员是建国初期难得的具有行政事务能力的人才，大部分行政实务都需要依靠他们，当时中共政权除了任用他们以外没有更多的选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施政更为顺利，中共政权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进行政治教育。第二个发动政治运动，并将动员去参加政治运动的教员和学生进行组织化。学生由学生会以及学联进行组织管理，教员则由工会进行组织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将教员纳入一个所谓“教育工作者”这种带有政治性并且意思暧昧的阶级划分中——“既是劳动者，也属于小资产阶级”——这样就会让教员们通过自身言行来表示自己不属于“反革命”，从而响应动员，并且形成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会在控制和动员教员时易于取得较好的效果。

1952年以后，对希望强化公办教育的中共来说，扩大和增强教员层才是最大的课题，所以有意思的是在建国初期的这些政治运动中，那些被认为是具有小资产阶级风气而失去工作的中间管理层，工薪层，地主，和一部分工商业者又因为具有学历和识字能力而转职为教员，所以在政治背景和出身上有问题的教员应该不在少数。这些教员和学生层在其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重新组织化起来。

本文将聚焦建国1949年到新中国教育业重新上轨道的1953年，选

取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松江县为具体考察事例,还原公办教育的重建过程。

序 言

要了解建国初期的学校教育情况,不言而喻,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要考察刚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政权当时的动向。中共政权是如何认识学校教育的中流砥柱教员层的,出于什么意图来决定并实施教育方针的?特别是如何看待并利用,或者说是打算如何利用公办教育、教员,以及作为教员预备力量的学生来稳定建立不久的新政权的?这些都是目前先行研究尚未解决的课题。针对这一切切入点,笔者将在本文考察当时教育业的重建过程,中共政权对学生、教员以及教育事业的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并最终实施的教育政策,尝试去把握在这实践过程中教育现场中教育实态,特别是政治运动和教育的内容。

本文将聚焦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到新中国教育业重新上轨道的1953年为考察时期,选取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松江县的初中教员和学生为具体考察事例。

就从前教育史研究成果来说,相关研究成果为数不多。近年在中国研究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金一鸣和卓晴君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未公开的资料(教育部档案等),尝试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教育整体像,但是就上述具体问题尚未能进行足够的讨论¹。另一方面,在英美学界有胡素珊(Susanne Pepper)的研究²,该研究将文革期前的教育政策史做了梳理和归纳,只是胡素珊的研究着重于对教育政策的分析,对于政治教育以及当时的教员、学生层的实际情况没有进行详

1 金一鸣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卓晴君《中小学教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2 Pepper, S.,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细的讨论。此外英美学界也有的 Gordon White 和 Eddy U 的研究对当时教员层的实态进行了考察³,但是对于政治教育和公办教育实际情况的记述还不够充分。在日本学界,较多的是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版的相关研究,对同时代中国教育状况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研究视点设定和使用的资料存在时代的局限和问题⁴。

在正式进入本文的讨论之前,笔者会在本节中将对作为本文的案例分析的上海和松江县当时的地理位置,行政上的定位做一个整理,并阐述之所以选择上海和松江县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上海市和现在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并不包含松江县等地,比现在的范围更小。此外,上海和松江一样都是当时国内教育先进地域。学校就有 234 所⁵。但是,即使说是教育先进地域,但是从 1954 年的数据来看,当时松江总人口数 43 万人中农业人口就占 35 万,可以说是一个农业县⁶。确实在松江县,学校,特别是初中高中都集中在县城,这样的特征正反映出了被称为“教育先进地域”的农业县的教育情况。所以笔者意在本文中通过对比作为城市的上海和作为农村的松江县双方的事例来进行发现问题和解析。

而在行政上的定位来说,双方都位于华东地区所以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均为饶漱石主席)进行管理,在之下设置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苏南行政公署,松江县是苏南行政公署下松江专区的一个

3 White, G., *Party and Professionals: The political role of teach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1 以及 U, Eddy, *Disorganizing China: Counter-Bureau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等。

4 新岛淳良《中国的教育》,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7 年。野原四郎·斋藤秋男编《集团主义と国民教育》,东京:国土社,1957 年。海后胜雄编《社会主义教育の思想と现实》,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57 年以及小林文男编《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东京:アジア经济研究所,1975 年等。

5 松江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松江教育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7 以及 47 页。

6 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松江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54 页。

县。在上海负责教育行政的机关是教育局,而松江县则是县人民政府的教育局(文教科)。这两者都是于1949年8月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负责教育的部分为基础成立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则分别由中共党员就任。但是领导人员并不是从华北或者东北的旧解放区调动过来的,而是出身于华东地区,并具有当地的教职和教育行政工作经验的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的教育政策和情况

1. 中央的教育政策

与建国后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方针息息相关的重要文件是1949年9月30日发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5章第41条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⁷。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马叙伦教育部长在开幕演讲中也提到了作为新教育方针的共同纲领。建国后,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指出“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⁸。此外,郭沫若也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其中强调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对建国后不久的公办教育所期待的是为了经营好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为发展农工业提供人才,与此同时,通过公办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更多的接受并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8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页。

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正如社会学所说的,近代公办教育具有传达特定的价值观,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同时可以作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装置发挥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非常重视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的。那么,到底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形成这一意识,并开始重视教育对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的呢?在下文中将通过对上海,松江两地的接管工作的实际状况来探讨其中的原因。

2.“接管”和学生,教员层的反应

首先本文将对建国初期上海的“接管”情况和学生、教员层的反应做一个考察。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马上就开始了接管(接收与管理)工作。高校机关从6月中旬开始进行接收,与中等初等教育相关的接收单位总共为503所⁹。刚解放的上海共有公办民办中等学校282所,公办民办小学1,113所,职工补习学校199所,共有教职员21,933人,学生约48万人,其中中等学生约98,000人¹⁰。在接管的同时,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党义,公民,军事训练,宗教等课程被全部废止,取而代之以实施设置政治课,和采用新教科书等措施,但是除此以外的业务则还是依照从前的情况办理¹¹。

虽然接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学生们与教师们大都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新教育政策,但是当时上海的中学学生与教师的思想倾向为:“怀疑苏联是否能无条件援助中国,对‘一边倒’问题,情绪上抵触,对外蒙、旅大及所谓搬机器问题,也还有不少学生思想不通。总之,对美帝还残存有幻想,对中苏友谊还残存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障碍”¹²,另外,一

9 熊月之编《上海通史 14 当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0 戴白韬《上海市教育工作的一般情况与今后任务》,《新教育》第1卷1期,1950年,第14页。

11 《陈毅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工作的报告(1949年8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52-153页。

12 舒文《思想政治教育总结》,《新教育》第1卷第2期,1950年,第20页。

些中学生还有“还是不解放的好”、“困难是共产党带来的”等的看法¹³。

另一方面,1949年5月底,上海的郊区松江一带解放,松江的学校也和上海一样,实施了废止训导制度,党义等课程,重新设置政治课等政策,除此以外还是依照原来的方式照常进行学校经营¹⁴。但是,在苏南地区,以教育为首的行政实务除了依靠“抱有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的留用人员和青年学生担任以外别无他法。当时,中共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提到,到1950年上半年“全区脱产干部共有36,000多名,其中来自老区和坚持当地斗争的干部约10,000名,留用人员也有10,000名,新吸收干部约16,000名,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¹⁵。就这样,在上海与松江两地,教员与学生层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和其政策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实际担任行政业务的人大多数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留用人员和学生,此外,当时在农村地区也尚未设置党组织(例如松江地区的学校到1951年才设置了党支部¹⁶)。

二,对教员层,学生层的动员以及实际情况

1. 作为劳动力或“干部”的学生与教员层

出于上述理由,中共政权不得不动员学生与教员层担任实际的行政业务。但是,因为工作量庞大,高层领导与社会也会关注他们的待遇与健康¹⁷。例如,1951年8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纠正学校教育

13 《贯彻二届学代会决议 新建中学传达大会 学生代表批判错误思想 号召克服困难学好正课》《大公报(上海版)》,1950年5月21日。

14 方如生《军管会接管学校纪事》,王勉主编《松江教育百年史话》,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

15 陈丕显《苏南三年》,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陈丕显在苏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16 松江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松江教育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17 新岛淳良《中国における义务教育》,《中国资料月报》第107号,东京:中国研究所,1957年,第22-23页。

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¹⁸，在这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各所学校中普遍发生了以下的现象：

由于各方面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大量干部，又由于有关部门对学校教育的重视不够，在学校教育工作方面，也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状态。有些地方强调“中心工作压倒一切”，而错误地将文教工作干部及学校教师，长期地和大批地调出来作中心工作。

在其它资料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1950年3月13日，松江县杨典村的小学校长某对县文教部门要求为进行合作运动派遣新的教师人员¹⁹。另外，吴江县乡村师范附属小学的美术教师徐元钧说，“上学期被地方政府抽调离校五次，配合生建科画农业生产图表一次，配合文化馆画制土改展览会、镇压反革命展览会、抗美援朝展览会和教育统计等计四次，每次多则五天，少则一天，共计十五天。学校里虽然只有一位美术教师，但为了服从中心工作的需要，也只好“招之即往”，以致影响教学，校内的环境布置反而没有充分时间，所担高级自然也有几棵未能教完”²⁰。这样现象，不仅发生在松江县农村，在上海也有。1950年7月，沪版《大公报》上有“会议多教员忙，活动多儿童损害健康”的记载²¹。在新解放区，特别是农村里，学校作为为数不多的具有组织性的劳动团体而被寄予期待。于是，学生和教员们会被召集去进行堤防的建设或者是参加驱除害虫的活动。比如说1950年，苏南人民公署就号召各级学校，

18 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苏南文教月刊》第2卷9期，1951年，第4页。

19 松江区档案馆所藏松江县教育局档案24-6，《关于教师调动分配工作通知》，1950年。

20 候锡爵《我对纠正混乱现象的看法》，《苏南文教月刊》第2卷第10期，1951年，第6页。

21 《批评市立第三区中心学校会议多教员工作忙乱活动多有疑儿童健康行政上操之过急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教育局派员检查协助检讨》，《大公报（上海版）》，1950年7月15日。

发动了驱除害虫卵的大众运动,为此取消了10天正常的学校教育活动,发出让师生都去参加驱虫运动的指示²²。此外,上述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里也有如下记载:“有些地方任意调派学生从事突击工作或临时工作,例如布置会场,欢迎欢送,甚至胜任集体纳税,农民集体缴公粮也要学生打腰鼓;区政府,派出所,工会,妇联等开代表会。也要教师和学生组织晚会,更有若干部门,不经过行政及组织手续,随意抽调在校学生和教师”²³。

大动员运动随之带来的是学生们的疲劳,教育现场的混乱等社会问题。早就在1950年6月19日时毛泽东就寄函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到注意学生健康的问题²⁴。甚至在1951年7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改善各类学校学生健康的决定”中,为了保护学生的健康,还规定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限制²⁵。

但是1953年3月教育部给上海教育局发出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了政务院于51年7月发布关于时间的规定,另外,1953年11月教育部发出的指示中也有“教师、学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和校内非教学活动的偏向”的一句²⁶。所以由此可知,在建国初期,即使有这样的规定实际上也无法得到遵守,不论是上海(城市)还是松江县(农村),学生和教员常常会被动员去参加行政工作和政治运动。

22 松江区档案馆所藏松江县教育局档案24-6,《关于教师调动分配工作通知》,1950年。

23 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苏南文教月刊》第2卷9期,1951年,第4页。

24 《关于注意学生健康问题给马叙伦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13页。

25 金一鸣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26 《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政务院第195次政务会议通过)》,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63-264页。

2. 作为“宣传工作人员”的学生和教员

另一方面,在政治运动的动员中,学生和教员也是被重视的力量之一。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朝鲜战争,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等,其中提出继续和扩大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和教育,并在全国内强化和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事教育”²⁷。

于是,对学生和教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变成了比起理论来,更重视宣传时事内容亦即“抗美援朝”等。教育的方法变成了在国语课和历史地理课中强调新中国的伟大,激发爱国热情,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对此有相关的教育实践报告进行了描述,除此以外还有开展报告,座谈会,板报,展览会,以及组织观看反帝国主义电影等活动,如“时事政治教育更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必然是行动。”、“每天规定一定的阅报时间和在课外活动内进行各种时事政治的座谈与活动”所指出的,推进和发动宣传组织和运动²⁸。在同时期中发表的论文《政治课教学的几个问题》中,推荐了“将课外学习和社会活动相结合”²⁹。如上述在华东地域强力推行时事学习的理由为以下两个。第一,动员社会参与朝鲜战争。当时还设立了军事干部学校,发动青年学生的参战运动。第二,维持社会稳定。比如在《苏南文教月刊》第2卷第2期中所刊载的记事中就提到:

十一月间,美帝侵略军打到我鸭绿江边时,谣言在传播:“共产党已决定放弃华东,血战东北,死守西北。”、“人民政府募捐寒衣是准备逃跑游击”,有的教师说:“国民党来了,要杀进步的教师和学生,首先就杀青年团员。”、学生问:“你怎么办?”,他说:“我逃到四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27以及39页。

28 戴白韬《必须深入开展时事政治教育》,《新教育》第2卷3期,1950年,第8页。

29 林英《政治课教学的几个问题》,《新教育》第2卷3期,1950年,第29-31页。

川去。”，师生思想很乱，不少人积极要求了解时事问题。

上文对当时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描写³⁰。另外，当时在南京某中学也传出了以下的谣言：“美国又有一新式武器，可以用大气压来压死人。”、“金日成已‘打死’了，朝鲜全部‘完蛋’”和“国民党回来，要杀少儿队员的头”等³¹。这些情况也反映出了一些当时的社会开始动摇的情况，因此，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教育”中，也有相关的实践事例指出当时教育和政治运动是紧密结合的，该政治运动同时也是宣传活动。在苏州的小学的事例中，甚至还描写到在家长会上向儿童具体说明什么是反革命分子，并宣传了他们的恶行，其后还到街头宣传打破敌人的谣言等³²。

此外，实施社会教育也是学生和教员层的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除了对工厂的工人以外，特别对农闲期农民的教育也尤为被重视。虽说是对象为农民，但是主要的教育对象还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民兵，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以及农会和妇女组织的干部等人。被动员到这场活动中来的有苏南地区的在职小学教员约1万5千人，被称为“群众教师”的识字农民和干部约1万人。据笔者确认，当时使用的教材有识字课本，常识课本和地理课本，识字课本的内容中除了朝鲜战争，政治和革命史以外，还包括了农业集团化，卫生，识字法等。此外，常识课的教学参考书中，列举了历史，地理，自然等三方面的教学目标，历史方面坚定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观，理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坚定革命斗争的决心。

30 吕英《1950年下半年常熟县中时事教育总结》，《苏南文教月刊》第2卷2期，1951年，第14页。

31 南京市委《南京各阶层对目前时局的反映（1950年11月1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1950年11月23日（收录于《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

32 蒋雄驭《我们怎样向儿童实施镇压反革命教育的》，《苏南文教月刊》第2卷6期，1951年，第22页。

地理方面则要理解祖国的地理和伟大,自然科方面则教育人们舍弃迷信观念,将生产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等内容³³。

那么实际的现场状况如何呢。在回忆当时苏南地区冬学运动的文章中,描述到了冬学运动:“不单单是识字教育”,他们在抗美援朝运动时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在土改时期进行了阶级教育,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进行了人民民主独裁教育,娱乐活动的形式由戏剧,歌唱团,朗读,幻灯片等他们都广泛采用。他们认为所有的活动都具有政治教育的意义,根据场所和时期的不同,与农村进行的各种斗争—征收粮食,防治虫害,反乱和防止间谍,保护粮食,捐款和慰劳,参军,土改等—相结合³⁴。由此可见,这样的冬学运动,并不仅仅是对农村非识字者进行识字教育,还具有向农村基层干部传达政权意识形态,组织政治运动的功能。

三,对教员层进行的政治教育

如上所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学生与教员层并不是一定都欢迎中国共产党执政,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的人也不是多数。但现实中行政业务没有学生和教员层的参与是无法进行的,所以他们还是被动员参加到行政业务中来。但是,学生与教员为何愿意将学习置之不顾,或者不惜影响到身体健康也必须要从行政事务和宣传工作呢,在其中是怎样的一个机制在运作。在这里单纯地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优势,独占暴力等因素是无法进行解释的。下面笔者就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策略,组织化,动员手法,政治教育等对其具体像进行描写。

33 王士哲编《农民业余学校 高级班 常识课本教学参考书》第1册,西安:西北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页。

34 《一年来苏南农民业余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和今后工作》,苏南文教月刊社编《一年来的苏南农民业余教育》,无锡:苏南文教月刊社,1951年,第2页。

1949年8月以后,上海各校以各种研究会、学习班、训练班的形式进行政治教育。1949年9月18日,成立了“政治教育研究会”。在政治学习中,以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指导性的问题、土地改革以及地主制度问题为主题进行讨论³⁵。另一方面,在松江的教员层也从1949年开始到1952年初以研究班的形式对14000余人进行了思想改造,到52年夏天,全区的初高中教员都投入了思想改造的运动中³⁶。

如上所述,不论是上海(城市)还是松江县(乡村),从1949年到50年,教育行政的中心课题就是对教员进行“改造”。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局长戴白韬也有如下意见:“我们认为改造学校的中心环节,是对师生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与提高”³⁷。这样政策与意见源于当时当局的如下看法:“教育工作者是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般都是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教育思想产生于政治思想,不搞通政治思想是不能产生正确的教育思想,也就不能做好教育工作的”³⁸。

四,对学生、教员层的组织化和阶级划分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组织学生的学联,和教职员的教育工会对学生和教员层推进组织化的。

学联是学生会的联合团体,其成员在1950年达到了17万人,其规模在上海的大众团体中排名第二,作为各种政治运动的中心进行活动³⁹。例如,1950年10月中国对朝鲜战争参战,11月10日与16日在

35 《市立中等以上学校 政治教育研究会成立》,《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9月18日以及左步青《上海学生卷入政治学习的狂潮!》,《大公报(上海版)》,1949年12月11日等。

36 陈丕显《苏南三年》,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陈丕显在苏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82-283页。

37 戴白韬《上海市教育工作的一般情况与今后任务》,《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50年,第14页。

38 郭人全《论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新教育》第1卷2期,1950年,第25-26页。

39 《上海的群众组织》,《大公报(上海版)》,1950年5月27日。

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就进行了学生会主导的反美运动,并在市内进行巡回宣传⁴⁰。这是职业团体中最早的活动,而由学生主导的政治运动的频度也是最多的。12月10日,由上海市学联组织,进行了10万人规模的反美游行⁴¹。

以教员为对象的中国教育工会于1950年8月在全国总工会指导下成立。吴玉章担任教育工会的主任。有入会资格者定义如下:“凡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科学院所领导下的教育工作者,不论在那一个学校、研究所、机关,不论教员、研究员、职员、校工、校警,也不分年龄、性别、籍贯、民族、国籍、宗教信仰,只要是以工资收入为自己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赞成本会章程,厉行入会手续者,均得本会会员”⁴²。

上海这些组织的实际情况,根据上海总工会的统计,上海市全体来说和教育相关的职工数达到了29,628人(男19,169人,女10,459人),其中加入了教育工作者工会的有13,259人,其中工人占2,282人,(男1,986人,女296人),教职员数共计10,977人(男6,085人,女4,892人)。此外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工人所属单位中,国营单位为4,829人,公营单位为7,882人,私营单位为16,917人。未加入者有16,369人,到1950年,加入组织率达到了44.7%⁴³。

另一方面,在松江1950年初以县政府组织的教师联谊会为中心,开始教育工会的组织化到50年年底得以展开,1952年4月,成立了中国教育工作者工会松江委员会,委员会下面持有12个基层组织,会员数

40 《抗美援朝运动风起云涌 复旦交大组宣传访问队 复旦两千人志愿参加访问队 交大本周减少授课时间加强时事学习》,1950年11月16日。

41 《上海十万学生大示威》,《大公报(上海版)》,1950年12月10日。

42 《中国教育工会章程》,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辑《中国教育工会工作者手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51年,第27页。

43 上海总工会组织部《上海职工会员及尚未入会人数统计表》以及《上海国营公营及私营企业职工人数统计表》,解放日报编《上海解放一年》上海:解放日报社,1950年,第81-89页。

为 356 人,占到当时教职员总数的 70%⁴⁴。这些教育工会的活动主要是召开交流会,给经济困难的教职员提供援助,建立托儿所,除此以外还召开时事政治讲座,组织参观抗美援朝展览会等等。

此外,共产党不仅对教员和学生进行组织化,为了将不愿服从的教员和学生排除出去,还利用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由此可以更易于进行管理和控制。当时教员作为“教育工作者”基本上是被划分为工人阶级。但是,所谓“教育工作者”的概念是非常暧昧的。例如,1950 年的《新教育》期刊的“问题商讨”的专栏里,一般的读者对编辑部提交了如下问题:“教育工作者的阶级成分,解放以前属于小资产阶级,解放以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原因是什么?”⁴⁵。据上述问题,我们都知道“教育工作者”概念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等概念距离不远,因此教员队伍比较容易因为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或者“改良主义者”的性质而被批判。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在 1951 年发生的《武训传》批判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说“陶先生歌颂武训的真实原因就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他以“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的逻辑来否定陶行知的教育理论⁴⁶。由此可见教员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而是因为他们出身的阶级被划分到了“既是工人,又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范畴中。因此,教员层不得不做出一些言行以主张自己不属于“反革命”阶级,所以积极地响应并投入到社会运动和行政事务中。也可以说如此带有政治性并且意思暧昧的阶级划分方式可以较为容易地控制教员层,在动员

44 松江区教育局编《松江教育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35-38 页。

45 《问题商讨》,《新教育》第 1 卷 4 期,1950 年,第 44 页。

46 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新教育》第 4 卷 1 期,1951 年,第 9 页。

时取得较好的效果。

此外在学校运营方面,也不是像国民党政权时代那样只有一名校长来掌控,而是由复数的教员和学生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来负责经营。所以,在国民党政权下由校长一人所掌控的人事权,财政权和学习指导内容的指示权从1949年以后分割为由校长和校务委员会两者共同掌控。这样的状态导致了学校内的等级结构复杂化,带来了会议的增加和学校运营上的混乱等不利因素。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状态也意味着只要教职员和学生团结一致就可以把控到学校的运营权。因此,学生们合法驱逐校长也成为了可能⁴⁷。不仅如此,学生还可以通过学联,教职员可以通过名为教育工会的组织排除校长的领导。学联和教育工会直接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在这些组织力量强大的学校里,通过这个机制将那些不合党意的校长或教员驱除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五,学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

——土地改革,爱国主义运动和三反运动

土地改革在苏南地区从1950年2月开始试点性的实验,50年底到1951年则正式开始了作为土地改革教育的关于土地改革正统性的宣传。因为人才不足,教员和学生们也被发动去参加土地改革的实际工作。当时苏南地区土地的实际情况,因为土地所有关系非常复杂,中农和雇农也被错误定位为地主,发动村民的运动也发生了暴力行为等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⁴⁸。

47 《接受师生家长的意见 教育局撤换三小学校长 他们一贯蔑视政府法令 实施奴化教育 阻碍师生进步》,《大公报(上海版)》,1951年11月16日以及《沪北三育小学全体师生来信 揭露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无耻行为 要求人民政府撤换校长吴方李!》,《大公报(上海版)》,1951年11月28日等。

48 白纯《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3期。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华东地区开始了土地改革,因为是以土地改革教育为名,所以有很多的教员和学生都参加了这次土地改革。比如说在《苏南教育通讯》第1期11号中就选编了“对于土改教育实施的几点意见”的特集,其中提到了土地改革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广大师生根据共同纲领及土地改革法认清土改反封建的必要性、正义性、建设性,了解土改政策法规的精神实质”,“使儿童懂得地主阶级的罪恶,和土地改革的道理”⁴⁹。这些方案的内容是在国文课,政治课,艺术课,历史课(在小学是常识课)等课程中对土地改革文献进行读解和议论,另一方面在实施这些教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报告就指出:

另一个偏向亦已经开始在部分学校中发生,如望亭小学有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儿童被一群儿童强迫坦白封建罪恶,坦白了还说不彻底,要重新坦白,结果弄的那个儿童,大哭回去,家长也跑到学校里来质问:“你们学校里是斗地主还是教书的?”……上述这种现象的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某些先生对儿童思想教育和教师的自我教育工作上,采用了急躁的粗暴的办法,把农村里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搬运到学校里来。学校是教育机关,先生和学生,主要的任务是教和学,在学校内部本身来讲,并没有阶级的对立,就用不着什么斗争或者坦白,即使是生长在地主家庭的儿童,对他封建家庭的剥削行为也不能有什么负责⁵⁰。

此外1950年10月1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发出指示,提到“最近在新区土改政策的学习中,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偏向

49 《苏南区中等以上学校土改教育实施方案》以及《苏南区各级小学校土改教育实施方案》,《苏南教育通讯》第1期11号,1950年,第4-5页。

50 陈弼《关于小学土改教育实施中的几个问题》,《苏南教育通讯》第1期12号,1950年,第27页。

和缺点。如湖南省部分中等学校搬用农村斗争的方式,斗争教员,斗争学生,甚至有因校长是地主,学校里发动斗争会罚他跪六小时的”⁵¹,还有在第1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里面也有以下的记载:“讨论了在剿匪反霸及土地改革过程中防止排斥知识分子,清洗地富出身的学生停办学校等“左”的偏向”⁵²。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土改教育升级后导致在当时的学校里一定也发生了上述的斗争情况。

而在苏南地区,1950年8月3日到9月8日苏南行政公署开办了“苏南二届暑期教育研究会”,与会的6,000多名中小学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和社教工作人员在会上学习了土改意义和相关法令,并在学习的同时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⁵³。在上海,1952年发行的《新教育》第3号也选编了名为“土改工作给我的教育”特集,从这个杂志特集中可以看到,土地改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进行讲义和讨论,小学以及高级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员们于1951年11月实际地去参加了安徽省北部的土地改革。

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抗美援朝活动也相继从1950年10月开始,于是在当时的教育界掀起了“爱国主义运动”。之前的政治教育的中心是“新民主主义”,此时开始向时事教育转移,“反帝国主义”成为了此时政治教育最优先的主题⁵⁴。于是鼓励大家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就成为了一种教育的方法,这点非常具有特色。也就是说,对学生进行的政治教育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听从指示实际前往街头参加政治运动,这样可以达到既对学生有教育效果,同时对社会也有宣传效果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51 《关于加强对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的指示》,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52 《教育部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1950年1月6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53 静予《记参加教研会学习的教师在土改学习中的思想改造》,《苏南教育通讯》第1卷10号,1950年,第12页。

54 郝晓卿《冷战期における中国教育の动向》,《政治研究》44卷,1997年,第11页。

1950年12月,上海教育局和华东区教育部发出指示强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事教育,特别是华东区教育部的指示还提到“即使是影响到正常的课程……教员和学生所接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意义重大”以此强化时事政治教育⁵⁵。在苏南区,最初开展的一边倒的土地改革教育,也在11月出版的《苏南教育通讯》12号中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展开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到了12月发行的13号,已经可以看到在几所初高级中学已经作为“时事学习”的内容进行了演讲活动⁵⁶。

1951年6月,中央教育部要求在中学以上的学校进行批判《武训传》的学习运动。但是,参加批判《武训传》学习运动的对象仅限于教师与学校职员而已⁵⁷,好像在上海与苏南区的学校里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运动。此外,在以教职员为对象的进一步详细讨论批判《武训传》的“座谈会”上,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异议⁵⁸。

1951年12月在学校进行的政治运动中,开始出现了“反浪费”和“反贪污”等口号⁵⁹。教育部门开始发动“三反运动”则是在1952年以后⁶⁰。针对教员,52年2月寒假召开的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工

55 《华东教育部指示 各地中等以上学校应及时转入正常学习并继续开展和深入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大公报(上海版)》,1951年1月3日。

56 刘定汉《我在苏州市所看到的几个中等学校时事学习动员情况》,《苏南教育通讯》第1卷13期,1950年,第4页。

57 《中央教育部指示教育机关 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人民日报》,1951年6月5日。

58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关于〈武训传〉讨论状况的来信》,《宣传通讯》第5期(收录于《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

59 《开展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个高等院校成绩显着 师生员工向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大公报(上海版)》1951年1月3日。

60 1951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发给教育部门促发动“三反运动”。《中央转发文委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04页。另外,《青年团市工委·市学生联合会 关于寒假工作的通知》,《大公报(上海版)》,1951年12月26日。通过上述报道,我们可以理解在1951年12月底时候,青年团与学联的工作以“思想改造”以及“反浪费运动”为中心。

作者分会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长陈琳瑚于2月11日发表了题为“关于三反五反的报告”的讲话。陈将三反五反描述为“对资产阶级侵略的反击战和保卫战”,又提出“为何要在学校内开展三反运动呢?学校并不是开展三反运动的主要阵地,但是学校里也存在着贪污情况”,同时还谈到“学校内的三反运动必须要和思想改造运动紧密结合”⁶¹。13日上午,分会会议上开始了自我批判,出席的成员开始对自己进行是否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进行自我批判,其中很多人还在前述三种行为的基础上还加上了自己在私生活具有享乐思想,讲究吃穿住,让子女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等自我批判的内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当时认为追求个人享乐是贪污的原因,教员还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旧思想所以才会出现浪费贪污现象,从这个论点出发进行批判的。所以从一开始,三反运动与思想改造就无法分割,或者说正如“思想改造就是以三反运动为中心的”这样的说法一样,特别是在学校里,针对教员层所进行的运动从头到尾都带有浓厚的对教员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色彩⁶²。2月18日上海市文教部门就被揭发出10名“大老虎”⁶³,这直接波及到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大学。但是根据4月1日中共苏北区委员会的报告,在1951年3月底之前的苏北地区,除了扬州中学和苏北财经学院以外,还没开始三反运动⁶⁴。还有根据中共华东局的报告,到1951年

61 《张文郁日记 1952年》2月11日。

62 唐致《〈三反〉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大公报(上海版)》,1952年2月8日、《开展三反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 华东高教界学习会议圆满结束》以及《为开展以三反学习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打下良好基础教育工作者寒假学习班结束》,《大公报(上海版)》,1952年2月18日。

63 《上海文教部门打出十只「大老虎」证明「清水衙门」没老虎的右倾思想是错误的》,《大公报(上海版)》,1952年2月19日。

64 《中共苏北区委员会关于苏北“三反”运动中十一个问题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编《“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收录于《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

4月底,华东区59所大学中已经有29所大学已经开始三反运动,而在中学,华东区总共1,670所的中学中,只有上海的47所中学开始运动而已⁶⁵,由此可知,在上海与苏南区,文教界的运动是先在大学内开展,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当年的秋天。此外,在学校正常上课期间开展三反运动和人民审判的斗争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可以从史料得知,在江苏省吴江师范开展的“跟反动思想的斗争”中某学生就得了神经病,在江苏省新海中学还发生了对工商阶级出身的约200个学生做斗争等这种较大规模的案件⁶⁶。

六, 1952年以后的教员层重组和政治教育

1. 学制改革和教育事业的扩大,教员的增加

1952年3月18日,制定了小学,初中和高级中学的暂行规程。同时导入了以校长为首的校长责任制,规定了初高中由省市的人民政府文教部门进行指导,使用教育部编撰的教科书,小学则接受市县人民政府文教部门的审查等内容。此外,也规定了民办学校也要接受市县人民政府文教部门的审查。这些学制改革的最大特征在于意在导入苏联模式和扩大教育机会,重组了之前的初级四年,高级二年的小学校制度,改为五年一贯制,还将只有农民和工人可以入学的工农速成学校也加入了正规的小学体系。但是,在小学方面,因为教员和设施不足的问题导致发生了混乱,小学校的五年一贯制实施不到一年也被迫停止。

随着教育事业的扩大,对教员的增加和师范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紧迫。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号召要在1956年以前培养出小学教员100万人,中学教员13万人。1952年制定了师范学校暂行规

65 《中央批转华东局宣传部关于学校三反运动及今后工作布置的报告》,《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

66 《注意纠正某些中等学校政治想教育工作中的粗暴作法》,《宣传通讯》1953年第18期(收录于《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

定(草案),制定了相应于高级中学的师范学校(3年制和4年制),相应于初中的师范学校(3年制),和幼儿师范学校,师范速成班(1年制)的教学计划。与此同时还做出了“关于短期内大量培养初等以及中等教育教员的决定”,制定了各种训练班的规定。于是,在工商业界出现大量旧职员被三反五反运动打倒失势的同时,训练班又吸收了大量失业的知识分子,他们被实施了短期的思想教育后,被任用为教员⁶⁷。亦即,使用了从1953年到1957年的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在上海,该期间小学教员增加了约1.1万人,初高级中学的教员增加了1.16万人,其中在初等教育中有14.5%,中等教育中包含了受训的人在内有45%是“失业知识分子”⁶⁸。

另一方面再看松江县的例子。通过分析1955年小学教员的名单⁶⁹,如表一所示,可以看到,尽管全体人数从1949年的762人增加到了55年的935人,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出身都为地主或者是工商业阶级。由此可知,从1950年代初期的教员构成来看,革命并没有给这个阶级带来巨大的变化,在革命和之后所进行的政治运动中,反而把政治背景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到教员层中来了。

此外,再看作为教员的后备军之一的学生,虽然有“向农民和工人敞开教育之门”的说法,但是在“大跃进”和1958年教育革命以前,松江的中等教育机关中农民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只有四成上下(人口比例农民和工人占八成以上)⁷⁰,可以说在1950年代初期和执政政权的政策和意图相悖,反而是政治上有问题的阶级出身的学生升学比例高,导致阶级的再生产的教育系统得以保存。

67 《关于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报告(1951年11月22日)》、《师范学校暂行规定(草案)(1952年7月16日颁布试行)》以及《关于大量短期培养初等及中等教育师资的决定(1952年7月19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28-129以及153-162页。

68 吕型伟《上海普通教育史(1949~198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

69 松江区档案馆馆藏松江县教育局档案24-44,《本局小学教师名册》,1955年。

那么中共政权面对这个状况采取了怎么样的对策呢?首先对于教员层,确保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对公办教育的管制。从表一可以看到,在松江县近三分之一的教员都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松江县虽然从建国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活动⁷¹,但是召开第一次县代表大会却是1953年。到53年全县有224个团支部和6,789名团员⁷²。

而在华北和上海等地,从1949年开始到50年前后,青年团组织已经开始在活动。比如在上海市闸北区,到1949年底已经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闸北区工作委员会,拥有三个总支部,37个支部,和1,175名团员。1957年团员数增加到了3,216名,其中教职员有701名。作为上海区级的青年团活动,可以看到他们举办了朝鲜战争的从军运动,还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⁷³。

对于学生,则采取了在前一节内容中所提到的设置工农速成学校,或者在入学考试中将学生的阶级出身作为评价条件等措施⁷⁴,意在变革原有的政治上有问题的阶级出身的学生升学率高,导致阶级再生产的教育系统。

70 松江区档案馆所藏松江县教育局档案24-15,《1951年上半年及下半年中学师范报表》、档案24-21,《1952年中学报表》、档案24-23,《1953年上半年中学、师范、中技、学期初及学期末报表》、档案24-42,《1954年下半年中学师范年初报表》、档案24-53,《1955年中学学年初报表》、档案24-63,《1956年中学学年末报表》、档案24-73,《1957年中学学年初综合报表及一览表》以及档案24-90,《1959年度中学报表》等。

71 盛济民《松江县第一个学生团支部》,王勉主编《松江教育百年史话》,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173-175页。

72 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松江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6页。

73 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周金彩,黄孟源主编)《闸北区教育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

74 文部省调查局监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令》,东京:樱书房,1956年,第73页。

表一:1955年度松江小学教职员的出身阶级(以935人的名单为基础的统计)

出身阶级	人数 (百分率)	共产党员	青年团员
商人、小商贩、商工业与手工业	161 (17.21%)	1	37
工人、工厂、雇工、工业与半工业	26 (2.78%)		8
城市贫民与贫民	15 (1.6%)		4
职工	67 (7.16%)		13
店员	5 (0.53%)		
地主、半地主、小地主与工商地主	267 (28.55%)	1	61
富农与中农	57 (6.09%)		17
农业、半农、农民与副农	29 (3.09%)		7
贫农、佃农与雇农	57 (6.09%)	1	13
教育工作者	84 (8.98%)		15
自由职业与医生	23 (2.45%)		7
职员	33 (3.52%)		3
其他与不详	111 (11.87%)		20
总共	935 (100%)	2	208

2. 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的变化——学制的制度化和在学科进行的政治教育
从1951年到1952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以后,在小学和初级中学设置了什么样的学科呢。

小学的学科可以参考1952年3月18日推出的“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其中规定了语文,算数,自然,历史,地理,体育,图画,音乐等学科。备注中提到自然,历史,地理三个科目虽然从小学高年级才开始单独施行,但是在低学年所实施的语文课的内容中也要涉及⁷⁵。教科书的清单中,1到4年级只有语文和算数的课本,5,6年级才会有地理,自然,历史三门学科的指定⁷⁶。并没有单独设置政治教育这个科目,而是通过

75 《小学暂行规程(草案)(1952年3月18日颁布试行)》,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42-144页。

76 《教育部、出版总署关于1954年春季中小学及师范学校教科用书的决定(1953年9月29日(53)厅秘董字第21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5年,第90-102页。

其他的教科书传达共产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笔者所收集的资料中可以看到的情况,高小的历史课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⁷⁷,此外,在《1952年编 初中投考指南》的问题选集⁷⁸中,历史课的问题有将近一半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的问题。

比教科书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实际的升学考试中的出题内容,所以在上述的应考问题选集中,笔者选择国语,历史,常识三科目进行探讨。国语和常识的问题有四个形式:问答题,二选一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填空,从下表表二中可以看到,在内容方面关于国际时事的出题非常多是整体的特征,关于模范的出题除了有苏联的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以外,还有在朝鲜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北朝鲜战斗英雄等人物,在政治关系方面,有关于中国的“国体”的问题,以及“三反五反”的内容,还有西藏和平解放协定签署的日期等。在日本的先行研究中也得出了“55年版的小学1到4年級的国语教科书的总课数148课中就有87课是国家建设相关的内容”,指出了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占40%,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内容占40%,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伦理的讨论占到约14%⁷⁹。在当时的教育界也有人提出了如“语文课都变成了政治课”这样忧心的意见。这开始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教育实习中,当时在中国访问的苏联教育学者对中国现场教育批判到“教员们只是按书讲课而已,完全没有考虑到如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面对这个批判,现场的教员们就提出了现在语文课都变成了政治课的担忧,希望在语文课中能够多重视语言学和文学的要素⁸⁰。

此外,初级中学则设定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

77 辜远编《小学高年级 历史参考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

78 上海惠林出版社编《1952编 初中投考指南》,上海:上海惠林出版社,1952年。

79 海后胜雄编《社会主义教育の思想と现实》,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57年,第182-183页。

80 吕型伟《上海普通教育史(1949-198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4-125页以及金一鸣编《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表二:《1952年编 初中投考指南》的内容

科 目	内 容 分 类*	问题数 (百分率)
语文科 (总共有 137 个问题)	内外文学知识	29 (21%)
	模范以及领导	22 (16%)
	政治、社会主义以及道德	45 (33%)
	其它内容	41 (30%)
历史科 (总共有 347 个问题)	1839 年以前	176 (51%)
	1840-1918 年	65 (19%)
	1919-1948 年	86 (24%)
	1949 年以后	20 (6%)
常识科 (总共有 92 个问题)	中国的地理与社会	16 (17%)
	模范、领导与政治	19 (20%)
	国际情势	49 (53%)
	其它内容	8 (9%)

*内容分类由笔者编辑。

革命常识,时事政策,外国语,体育,音乐,美术等各科目⁸¹。之前在初级中学中“政治课”所实施的政治教育则细化为“中国革命常识”“共同纲领”“社会科学基本常识”(之后出现在“宪法”课)等。在初级中学,虽然和政治相关的课时不多,但是和小学一样初中的语文,地理,历史课的内容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政府是这样通过学科和教科书向学生和儿童传达意识形态的。

结 语

本文通过考察建国初期的公办教育重建,试图还原当时历史图景可以看到,建国初期,学生和教员层方面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新政权执政,甚至大多数人都没法做到完全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同步的,因此中共政权对于教员和学生所“持有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具有很

81 《中学暂行规程(草案)(1952年3月18日颁布试行)》,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39-142页。

强的戒备心,然而,因为人力资源不足,他们是建国初期难得的具有行政事务能力的人才,“新解放区”的行政实务大部分都需要依靠这些学生和教员进行,所以中共政权除了任用他们以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解决。

第一个,就是从1949年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建国后不久的这个时期,通过政治课,或者是语文课,历史课,地理课等科目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还将政治教育与实际的政治运动相结合并使之具有正统性。这样的政治运动同时也要在农村和工厂等学校以外的地方进行宣传活动,所以实施的量非常大。其结果,学校,教员学生不但是政治教育的被实施对象,也同时成为了政治教育者,亦即他们自身也成为了向社会宣传政策的媒介者,发挥了推动作用。在此处笔者想强调的,最重要的并不是实际上思想改造的效果有多大,而是这样的一种忠实于中共政权所指示的意识形态参与政治运动的做法本身渐渐地形成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另外,这样具有偏向性的政治运动虽然让正规的学习教学课程产生了偏颇,发生了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问题,但是也让学生和教员的生活变得非常繁忙,从而也就在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自发地去参加不是政府组织的其他社会活动了,这也就达到了消除对政权不利的因素的效果,亦即学生运动,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变动要因之一也可以得以排除,保持社会的安定,减少动荡的要素。

1952年以后,小学教育正规化,此时开始转向为减少运动形式的政治教育,主要通过语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中频繁提出政治性的主题,并在升学考试的题目中出现等形式,继续向学生和民众进行政治教育,宣传革命的正当性和中共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方面的对策,就是将有可能动员去参加政治运动的教员和学生进行组织化。建国后不久,学生由学生会及其上级组织学联进行组织管理,教员则由教育工作者工会进行组织管理。在这里必须要注意的

一点是,将教员纳进一个所谓“教育工作者”这种带有政治性并且意思暧昧的划分阶级方式在控制和动员教员层时易于取得较好的效果。教员并不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内容,而是以他们的出身阶层进行非常政治性的分类,亦即“既是劳动者,也属于小资产阶级”。于是在三反运动的时期,教员层被认为具有的小资产阶级风气,就被理所当然的等同于在私生活上持有享乐思想,讲究衣食住,给子女接受资产阶级教育,从而成为了进行自我批判的对象。为此教员们不得不通过自身的言行来表示自己不属于“反革命阶级”,接受到底自己是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的判断,从而响应了中共政权的动员。形成这样的社会环境会更易于动员教员层的力量(以及教员的后备军学生层)。

然而,值得让人寻味的是,在建国后不久的政治运动中,这些被认为是具有小资产阶级风气,贬为道德颓废的,因此失去了自己工作的中间管理层,工薪层,地主,和一部分工商业者却因为自己具有学历和识字能力而转职为教员,这些事例应该并不少见。因此,1952年以后,对希望在学校教育中强化政治教育的中共中央来说,扩大和增强支撑着公办教育的教员层才是最大的课题。而这些教员层和学生层在其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重新组织化起来。

通过对教员和学生的组织化和公办教育的扩大,中共政权意在宣传政治教育,革命的正当性,和其意识形态。但是公办教育的发展,并不是只靠政府当方面强制性推行就可以顺利进行的,当时的学生和民众们又是如何接受公办教育这一面相也需要进一步的考察。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将赐别稿另行探讨。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における 上海および近郊農村における公教育の再建

要旨：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生・教員層は、中国共産党の執政を必ずしも歓迎し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共産党政権も「ブルジョア階級思想を持つ」として教員や学生に対し警戒心が高かった。しかし、人的資源の不足から、行政実務の多くはこういった学生・教員層に頼るほかに方法がなかった。そのため以下2つの施策が行われた。1つめが、1949年から行われた政治教育である。2つめが、政治運動と、それへの動員である。学生は、学生会とその上部組織である学聯によって組織され、教員は教育工作者工会によって組織された。特に重要なのは、彼らは「教育工作者」という、「労働者でもあるが、小ブルジョワ階層出身」という政治的に曖昧なカテゴリーに分類され、自らの言動や行動から、自らが革命階級なのか反革命階級なのか判断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のような社会的環境は、教員層の動員を容易なものとしたと言えよう。しかし、皮肉なことに、建国直後の様々な政治運動で、小ブルジョワ的「気風」ゆえにその職を追われた中間管理者層、サラリーマン層、あるいは地主、商工業者層の一部は、その学歴と識字能力ゆえに教員に転職し、政治的背景や出身に問題があるという教員が相当な程度で存在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の後、教員層と学生層は、新民主主義青年団を通して改めて組織化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このような教員・学生層の組織化と公教育の拡大を通して、共産党政権は革命の正当性と中国共産党のイデオロギーの宣伝を企図したのである。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in Shanghai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not all students and teaching staff welcomed the new reg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as vigilant about those who had “bourgeois ideas.” However, the lack of human resources forced the new regime to rely on them and implemented the following two measures.

The first was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conducted since 1949. The second measure was the political movement and its corresponding mobilization. Students were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 Union, while the teachers were organized by the Education Workers Association. Importantly and politically ambiguous, these teaching staff were called “educational workers” and classified as “educators from the petit-bourgeois,” which meant they might be judged to belong to a revolutionary class based on their own words and actions. In this special environment, it was easier to mobilize the teaching staff.

After 1952, to strengthen public education, the CCP government expanded the teaching staff. Ironically, the CCP government recruited the middle management, salaried workers, landlords, and som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that were considered “petit-bourgeois” and thus lost jobs in various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transferred them to teaching positions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literac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many teaching staff members had a problematic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origin. Later, th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re-organized under the Chinese New Democracy Youth League.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period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1949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ducation in PRC in 1953, choosing Shanghai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Songjiang County—as a case study for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ublic education.